第一张骨牌

隋唯一

清华大学 软件学院

学号：2017011430

邮箱：swy17@mails.tsinghua.edu.cn

序

严格意义上来说，鸦片战争并不意味着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只是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的第一步，不过通过研究这一场战争我们就可以推断出崩溃的必然结果，这也是我选择阅读的这部著作的主要写作目的。

那么我通过阅读这部著作得到了什么？或者说我想通过我的读书报告让未读这部著作的同道了解到什么？我想，应该是历史的力量，那种必然性，那种不可抗拒性。是这种感觉，即我在想象中不断为清帝国寻找出路，但都是死路。千年的制度，庞大的帝国不堪沉疴。车轮转动，第一张骨牌已经推倒，最终的崩溃也就成了可预期的必然。

于是我想通过多个方面论证历史的必然性，我想展示清帝国在多个时间节点上注定做出的错误选择，在微观上输掉了一场战争，在宏观上输掉了一个国家。

历史没有偶然，不要招魂，我们要做的是缅怀与反思。

是为序。

第一张骨牌

——《天朝的崩溃》读书报告

摘要：

在阅读《天朝的崩溃》这本书的时候，随着阅读的深入，我对于天朝的不同层面的概念上的理解，以及对于崩溃的进程的逐渐思考，使我认识到鸦片战争的失利只是一个开端。我们曾经有过机会，但是由于这个国家的种种特征，这些机会注定会被我们错过。

本文将在明确概念的基础之上对此问题进行粗浅的探讨与反思。

1. 何谓天朝 何谓崩溃

鸦片战争这短短三年，相对于天朝的崩溃过程，仅仅是一瞬间，但是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给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强有力的初速度，使其超过了在自身制度内调节的临界点，并最终冲破它自身强大的惰性而不可逆地走向崩溃或说新生的道路。

* 1. 天朝概念的形成与解析

天朝概念是如何形成的？应当说，作为一个民族的集体认同（至少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是这样），而不是某种国家刻意进行的意识形态宣传（这一点我会在后文解释），天朝的概念，与中国人的“天”的概念是密不可分的。诗经有云：“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从我们的文化本源开始，我们的意识中，我们就是“天下”，也就是说，我们只有世界的概念，而没有国家的概念。注意，这并不等于“国家即世界”。相反，在同时期的西方，由于城邦文化的盛行以及宗教的强大感召力，人民意识到，世界是由诸多国家构成的，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当然不能按照国内的民族关系来处理，而恰恰是这一点，使我们在鸦片战争吃了亏。

经过以上的讨论，我们其实只得到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天朝”概念的基础是一元世界观，也就是，我们与“蛮夷”、“番邦”之间的矛盾是“国内矛盾”（当然，由于没有国家的概念，也就无所谓国内国外了）。

另外还有一个基本事实，即由于我国人类文明出现较早，完成统一较早，我们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等全方位领先于世界各族，这导致我们形成了一个先验条件，即我们必定是领先的。在今天的我们看来，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正如自然科学中各种公理的产生一样，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们确实找不到反例来证明我们并不是最先进的，故而“我们是最先进的”正如一条公理一样，不可反驳。

既然我们默认世界上只有我们一个国家，那么所有新发现的陌生人，陌生的种族，都是国内的新民族；既然我们长久以来默认我们是优等种族，那么所有的异族便都是落后愚昧的蛮夷；既然他们是蛮夷，那么纵使他们展示出某些神奇的机械，也只能是“奇技淫巧”,乃至于“凡是蛮夷所擅长的，我们要坚决反对；凡是圣贤所教导的，我们都要始终不渝地遵循”。如果被蛮夷修理了呢？恐怕只有做阿Q，来一次澶渊之盟；如果被按在地上，叫着“虫豸”呢？那便是天朝真正的“崩溃”。

在这种崩溃到来之前，由于现实世界与我们认识的世界差距是极小的，也就是说在大部分时期我们在大部分方面是领先的，我们可以通过政府宣传对于那些少数的、我们不能领先的方面进行扭曲与修正，故而我们虽然在明朝就已经目睹过红夷在火器技术上的优势，但是我们的天朝世界观反而在明朝得到发扬光大，因为在明朝，我们拥有强大的宣传机器，即理学。

综上，我们的地理位置决定了我们民族内心深处的世界观，我们的世界观决定了我们长久以来的政治制度以及政治宣传，而这种制度以及宣传反过来作用于我们的世界观，并逐渐加强。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天朝心态是由朴素的地理上的认识逐渐上升到一种意识形态的，而我们对于这种意识形态的解析过程正好相反。

* 1. 崩溃的层次

我们所说的崩溃，是指天朝的崩溃；因此崩溃的层次也就对应于天朝概念的层次。也就是政府的崩溃，体制的崩溃，心态的崩溃，文化的崩溃。（注意这里的文化是以华夏天朝为中心的一套文化系统，而不是我国的全部文化）。

具体到鸦片战争以及由此开始的近代史中，首先我们承认了蛮夷的科学与技术确实发达，需要“师夷长技”，这便是心态上的动摇，由此而来的对于宪政的要求（“皇族内阁”毕竟也是内阁），对于兴办商业、新式军队、新式学堂、君主立宪的尝试（百日维新），科举制度的废除，乃至于辛亥革命的革命纲领与革命理想，都可以视为天朝制度的松动以至于崩溃，当这种制度崩溃之后，依附于它的政府自然而然就不复存在，迅速而理所当然，这也是清政府，相对于其余封建王朝政府而言，被推翻的如此之快的原因之一，其余封建王朝政府的被推翻，譬如从土壤中连根拔起一棵巨树，而清政府这棵巨树，失去了土壤，于是轻轻一拉便轰然倒地。当这个政府最后的遗老遗少们都消失了，当没有人怀念那个天朝的时代了，天朝的文化，就真正崩溃了。

鸦片战争这短短三年，相对于天朝的崩溃过程，仅仅是一瞬间，但是它的重要之处在于，它给了这个庞大的帝国一个强有力的初速度，使其超过了在自身制度内调节的临界点，并最终冲破它自身强大的惰性而不可逆地走向崩溃或说新生的道路。

政府、体制、心态、文化的崩溃层次是逐级加深的，而崩溃的顺序是心态、体制、政府、文化，与层次的顺序近似相反。

* 1. 崩溃的真正形态

我们总是喜欢使用崩溃这个词来描述一些原本坚固的事物或概念在较短时间之内的消亡，但是，以我们现代人的眼光去观察鸦片战争对于清帝国的冲击的话，仅仅一个泛泛的“崩溃”是不足以描述当事人在思想观念上所受到的冲击的。

无论是林则徐还是耆英还是伊里布，在他们真正目睹英吉利的强大之前，是绝不会相信堂堂天朝会在战争中完败于英夷的——这里的完败指的是军事斗争——但是这就是事实。我一直尝试着用他们的视角去思考军事上的失败对于他们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天朝公理系统”的破灭，因为“天朝不可战败”是这一系统的基本公理，是不须证明的。

一场战争的失败，引发了一个民族思想上的毁灭，这看似荒谬。然而，当我们通过这场战争，发现了我们思想大厦的一个基石的不科学性，那么我们的思想体系结构也就随之崩塌。天朝战败对于清帝国的当事官员（也只有他们亲眼见证了清帝国的战败）的冲击，不亚于无理数的发现对于数学界、相对论的提出对于物理界、日心说的提出对于中世纪的宗教界的冲击，尤其是最后一点。

既然天朝可能战败，那么天朝是否存在“另一个选项”？封建制度是否是管理国家的唯一手段？圣人们所说的，能否是有错误或说局限的？天朝的理论大厦就这样被质疑的潮水冲刷、剥离、摧毁。

当然，站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永远无法真实的体会那些首先，也是被迫，睁眼看世界的先人，他们受到了多大程度的惊吓，他们对于自己价值观的质疑乃至拷问所导致的痛苦与迷茫。但是我们知道，“崩溃”这个词，并不是随随便便用在这里的。

应当注意的是，1840年的鸦片战争，对于清帝国的崩溃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但对于那些一线的官员，却几乎是结束，从主战派到主和派，从“忠臣”到“卖国贼”，从某些层面上来说，这些官员的选择，是他们对于“天朝”丧失信仰的体现，也是当时的主流社会仍然坚持“天朝世界观”的反映。正因为他们不相信天朝居然会失败，所以他们坚称主和派为奸佞；正因为在天朝理论体系中，天子是不会犯错的，那么国家出现了问题，就必然是奸臣当道。天朝的理论体系是如此的完美自洽，而我国的体量又是如此庞大，这决定了崩溃的发端必然很不容易，但是，它确实开始了，缓慢，却又不可阻挡。

一场小小的战役的失利，对于庞大的清帝国是无法构成根本的生存威胁的，可怕的是它打开了一个先例，一个天朝不再号令四夷的先例，一个夷人要求开放通商的先例。正如AIDS对于人体的瓦解一样。

另外，除了对于少部分人价值观念上的冲击以外，“崩溃”也意味着天朝经济体制的瓦解，这一点在我们今天看来最为显然，但在当时的朝廷上下，在完全不了解现代经济理论的条件下，对于放弃海关对经济上的危害，是毫不知情的，而这一点，正是清帝国在鸦片战争军事斗争之后的政治斗争中，犯下的最大失误。

1. 天朝必定战败

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命运的悲剧：这个古老的帝国太过强大，以至于没有给自己多留一个与蛮夷认真谈判的选项。

2.1 天朝的自洽理论结构

这一部分的主要目的在于回答这个问题，即为什么在鸦片战争之前的1600年间，天朝的体制虽面临诸多的考验但并没有瓦解，而在鸦片战争这一小规模局部战争（与我国历代王朝的建立与蒙古与后金的征服相比）之后就不可逆地走向了瓦解。

为此我们必须分析天朝理论体系的逻辑结构。在有限的篇幅之内我们当然不可能分析得十分详尽，这里只分析使这套理论本身变得稳固的部分。这里的关键是文化上的绝对自信。所以顾炎武当年会提出“亡国”与“亡天下”的辨析，而对于刚刚接手中华大地的清来说，最便捷的方法就是继承以及加固前朝的文化统治体系，以驾驭顽固的汉族官僚与乡绅阶层，所以我们的背景——清，依然是天朝的理论结构。

这个结构的逻辑在于，对于蛮夷，天朝当然是高高在上的，所以在军事冲突中，天朝一定是会取胜的这当然是得益于天朝威名远播，令四夷归化；若是失败（当然，在天朝的字典上不存在“失败”这两个字，这里说的是实际情况），无非是两种情况：一是进行和谈，蛮夷所要求的金钱土地对于“物产丰盛”的天朝来说，实在是九牛一毛，而换来的蛮夷的臣服，哪怕是形式上的臣服（比如西夏），对于维护天朝的至高性以及天朝文化的先进性却是更加重要；二是蛮夷拒绝和谈（虽然这种情况比较罕见），于是主管此事的大臣必为奸臣，所谓奸臣误国，也就是说天朝的理论是没有错的，错的是理论的执行者，天朝的皇帝是没错的，错的是皇帝手下的臣子。

换言之，正如我们求解一道数学题一样，如果我们的答案是错误的，并不意味着我们用以求解的定理和公式是错误的，而是我们的执行有误。

正如哥德尔的不完备性定理一样，在天朝内的人，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通过天朝理论体系内部的结论来推翻“天朝至高无上”，或说“外国皆蛮夷”的结论的。

天朝理论最大的优点之一就是不管面临多么大的动荡（在一定的阈值内），天朝的理论是不会受到影响的，虽然理论的执行者可能会产生变化（如历史上历次农民起义）。因为改变这种理论的想法在生活于其中的人民心中被先天性地消除了。

然而天朝理论最大的弱点就在于此，这套理论系统关闭了自我更新与改进途径，也就意味这，当动荡超过了上文提到的阈值时，天朝的理论体系会发生不可逆地崩溃——也就是说，当蛮夷不求金钱，不求土地，只求莫名其妙的通商，而公认的忠臣能臣（伊里布、林则徐等）屡次折戟，蛮夷也在礼制上与自己平起平坐（注意战争后期英帝国对清帝国递交地书信时官方的国书）时，一切都超出了天朝理论的解释范围，而这套理论体系并没有允许自己更新，于是自然而然地，天朝理论体系开始了崩溃。

中华民族的内心深处是渴望稳定的，这种渴望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可以以牺牲一些利益为代价；这种渴望又是如此顽固，以至于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追求的不是稳定，而是一种变异的一成不变。

2.2 为什么是英吉利

这里的“为什么”，指的是把英吉利与天朝在鸦片战争之前入侵乃至征服中原的诸民族（包括建立清的后金）作一比较，也是对上一节的补充。也就是说，为什么是英吉利开启了天朝的崩溃之路，而不是历史上曾经给我们带来更多伤亡的匈奴、蒙古、党项、女真。

结论其实非常直观，英吉利是以一个独立国家的身份对我们进行了入侵，而不是以野蛮的异族的身份。虽然在清帝国的眼中他们依然是蛮夷，不过问题就出在这里。英吉利所表现出的文化上的高度文明、军事技术上的高度发达、谈判技巧上的高度熟练，使得清帝国对于“蛮夷”的认识遭到了颠覆，从而导致清帝国的部分人（在初期是极少部分）对于自身是否为“天朝”产生了怀疑，其最直观表现即为在鸦片战争中期出现的避战不出的现象（如伊里布对于道光帝从诚实到欺骗），与之对应的是大部分不了解英吉利实力的国内知识分子对于这些因了解而对英吉利采取谨慎态度的大臣关于是否为奸佞的质疑与指责，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琦善等人被作为奸臣的代表而为鸦片战争的战败而负责（见本书绪论）。

很有趣的一点是，把外国当作蛮夷处理的天朝理论在鸦片战争前屡试不爽的原因是，在英吉利入侵之前，入侵我国的各国家或各民族确实在整体上落后于我国，尤其是在文化方面；换言之，天朝的理论系统与外交策略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其实是正确的。

但是，正确不意味着没有弱点；一时的正确并不意味着始终的正确。天朝的弱点，在于它不允许自身进行改进与强化。世界各民族，当它们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处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时，或多或少会出现类似于天朝的某种近于自大的情怀，但是，似乎只有我国出现了封闭与拒绝自我更新的现象，这才是天朝真正的弱点。而这种弱点又源于天朝制度的优点，那就是庞大的官僚体系，正是这个体系保证了在那个通讯非常落后的年代一个庞大的帝国能够有条不紊地运转，也正是这个体系，在面对突如其来地巨大变故（比如拿着先进武器莫名其妙闯进国门要求通商的“英夷”）时，内部的官员便会出现推诿塞责，欺上瞒下，虚报战况等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战役的失败，信息的不对等，改革的迟缓，以及最后的大失败。

所以，英吉利只是一个偶然，因为就算没有英吉利，还有法兰西，乃至于曾经臣服于天朝的日本，英吉利的特殊性不过在于它在列强之中更加具有侵略性（近代吃天朝这只“螃蟹”的第一国），同时它较之历史上侵犯天朝的诸民族更加强大，成为首个综合国力强于中国的入侵民族。

英吉利又是一个必然，这是自给自足的守成农业国与渴望倾销市场的新型工业国的必然冲突。但这个问题不在我们讨论的范围内，故不再赘述。

2.3“剿”还是“抚”

在世界各国的发展史上，似乎只有我们出现了这样的外交理念，即默认外族均为落后者，而我们所做的仅仅是“进剿”或者“安抚”。摆在我们面前似乎没有国与国之间所谓条约的概念——我们认为这是“抚”的手段，对待战争也是以戡乱的态度，这一点在鸦片战争中对于英国的诏书“大皇帝统驭寰瀛，薄海内外，无不一视同仁……现已派钦差大臣驰至广东，秉公查办，定能代申冤抑。该统帅懿律等，著即返棹南还，听候办理可也。”注意这是在清战事不利时求和的书信。

就上文的诏书而言，需要注意的是这是道光帝在不明情况（也就是我方屡战屡败而且“蛮夷”并非乞和）的条件下颁发了这份诏书。但是，当我们进一步分析道光帝不明真相的原因时，我们发现这实际是“剿”与“抚”视角的必然结果。试想当我们在考试时遇到一道我们觉得没有正确选项的选择题，而我们还必须做出选择，那么正常的逻辑是选择那个与你所预期的答案最接近的选项，而在英吉利给清帝国出的这道答案是“降”的选择题中，清政府在“剿”与“抚”两个选项中选择了更接近于正确答案的“抚”。

这听起来很荒谬，但是，从对于英方提交的文书的翻译开始，本次事件在中英双方的眼中便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经过天朝心态这一棱镜的折射，强大的英吉利也不过是英夷，“demand from the Emperor satisfaction and redress”（要求皇帝赔偿并匡正）扭曲为“求讨皇帝昭雪伸冤”，抗议与要求变成了伸冤与乞恩，君主立宪变成了大臣擅权，经商贸易是舍本求末，男女平等是牝鸡司晨，机械仪表是奇技淫巧，诸如此类。

站在这段历史外面的我们审视这段历史的结果，觉得清帝国的滑稽可笑，但是当我们去审视这段历史的细节，去观察造成这段历史的诸多时间节点时，我们发现一切都是那么合乎规矩与理所当然。假如我们是林则徐或是奕山或是伊里布等等，当我们面临一群兜售毒品的陌生人，我们的第一想法确实是走法律程序（事实上林则徐在战争前的查禁鸦片与扣押人员确实是符合《大清律》的）；如果这群陌生人坚持兜售毒品呢？那就只好诉诸武力了。于是我们开始战斗，战斗失败。但是在我们的认知中，不存在能够打败我们的军队，那这群陌生人一定使用了巫术，怎么对付呢？那就请和尚道士作法吧（事实上确实有官员请道士作法以应对英军的战舰）。战争结束了，英夷要我们开放海关。看来进剿是行不通的，那就安抚这些蛮夷吧，反正海关什么的对于以农为本的天朝上邦没什么用处，那就做个人情送给蛮夷作为安抚吧。蛮夷竟然在文书之中对我们语气不敬？不要紧，我们靠翻译就可以弥补。

于是清帝国理所当然的纠结于咬文嚼字而忽视于谈判的具体内容；理所当然的认为蛮夷受到了自己的安抚，而安抚他们的代价仅仅是一文不值的海关权益；理所当然的认为自己是赢家；理所当然的，那些面对这么不堪一击的蛮夷都要和谈的大臣，是可笑的奸臣（琦善）。

历史的神奇之处并不在于某些事实在今天看起来有多么滑稽可笑，而在于如果我们身处当时的条件我们会做出与古人相同的选择，即使这种选择的结果在今天看荒诞不经。这是历史的悲剧，也是命运的悲剧：这个古老的帝国太过强大，以至于没有给自己多留一个与蛮夷认真谈判的选项。

2.4 战略溃败

鸦片战争战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今天我们讨论战败的原因，无论是思想上还是技术上，清帝国都是落后于英吉利的，失败得毫无悬念。

但我们注意到，在同样的历史时期，我们曾经与另一个列强——法国，发生过激烈程度不亚于鸦片战争的战斗，并取得惨胜，史称“镇南关大捷”。然而战争结果呢？镇南关大捷之后，中法签订《中法天津条约》

“ 第二十九款 大法国皇上任凭派拨兵船在通商各口地方停泊，弹压商民水手，俾领事得有威权

第三十四款 遇有大法国商船在中国洋面被洋盗打劫，附近文武官员一经闻知，即上紧缉拿，照例治罪。所有赃物，无论在何处搜获及如何情形，均缴送领事官，转给事主收领。”

海关依然形同虚设，对于国际惯例的无知导致清帝国把不平等条约当作平等条约，把霸王条款当作正当协议。

我们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输了。无论我们在战斗中胜利或者失败，最后签订的都是不平等条约，而且很多隐含的不平等并不能被文盲一样的清帝国官员所认识到。

条约这些东西，归根结底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因为国力落后于人，所以一切的外交努力注定徒劳。弱国无外交。

1. 从战败到崩溃

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黑格尔

3.1战败不等于崩溃

在构思这篇论文的时候，我一度把这两个概念——“战败”与“崩溃”，混为一谈。而我们阅读这本书，甚至于茅海建先生写作这本书的时候，多多少少会把战败与崩溃的分析掺杂一起。这会混淆我们研究的问题：天朝的崩溃，并不等同于一次战斗的失败，虽然这次战斗是天朝崩溃的导火索。

正如我国的历次改朝换代时的屠杀没有阻止新朝的盛世，珍珠港的惨败没有阻止美国的崛起，二战的废墟没有阻止战后日本经济的腾飞。一些在当时被认为是决定国运的战争，最后并没有对于国家体制的存亡产生多大影响，而鸦片战争这场参战人数在峰值仅仅二十万（注意是调动的部队的人数而非直接投入战场的人数）的战争，却引起了天朝崩溃的连锁反应。天朝崩溃的原因，绝不是一次战争的失败这么简单。

崩溃是综合国力的水平低于某一个临界值所导致的。我们看到，有许多言论强调鸦片战争时期清帝国的综合国力如何如何，GDP占世界三分之一，高于英国多少个百分点如何如何。然而综合国力并不是简单的资源上的叠加，它需要考虑资源的调动效率，这个效率是由科技水平，管理水平，制度水平等等所决定的。

譬如由于交通技术上的差距，清帝国即使调动十万人的军队，也只能分批抵达战场，实际上发挥的战斗力相当于一两千人；而英军三千人，凭借过硬的运输技术可以在战场各地高速驰援。

经济上同样如此，家庭手工业虽然在总量上暂时可以碾压英吉利的工场制造业，但是一旦海关放开，注定会被高效率的工厂产品挤压至破产（这是鸦片战争的后话了）。

以上例子是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即综合国力需要考虑的除了资源（人口，经济，矿产等等）的总量，还要考虑资源的质量。在那个天朝一家独大自给自足的时代这些都不重要，但是有一天我们的外交擂台上加入了强大的对手，出现了实力上的对比，出现了强弱之分（之前由于天朝在自己的世界里太过强大，导致几乎不存在国立上的对比），而不巧，清帝国是弱势一方，而弱，就是原罪。

需要注意的是，综合国力的对比，在具有偶然性的某一场战争中，与战争的结果关系不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也曾经在镇南关取得胜利，又在胜利之后签下失败的条约。胜利的战斗是偶然，失败的条约是必然，因为羸弱的国力不足以支撑我们把战争进行下去，所以只能求和了事。

3.2奔溃前奏：所谓气数

气数这个词，在汉语中通常搭配着“已尽”出现这里要说的，就是清帝国为什么气数已尽，或说为什么清帝国国力已经衰弱到不足以支撑它签订一个平等条约，更不要说签订条约之前的战争的胜利。这也可以作为3.1的补充。

《孙子兵法》有云：“胜者先胜而后战”。英吉利胜在整个体系上。

我们在整个战争过程中，虽然是一个大国，但实际上是一个分裂的大国。我们的军队不知道为国家而战（如果我们把占军队大多数的临时雇勇也成为军人的话）他们是为家园而战。故而只要英军不损害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是不会卖命的。

第一次定海之战，清军仅伤亡26人就大量逃散，第二次定海之战，震远炮台守军面对英军的舰炮火力溃逃，炮台不战易手。厦门之战，清军“厦门岛南岸各阵地清军战死40余人，鼓浪屿清军战死33人，受伤37人”，而减员达到324人，其溃逃的人数可见一斑。

而在英方的文件中，多次记载清国百姓在两国交战的时候看热闹，即所谓“看洋景”，又有记载，只要出钱，便可雇佣清国百姓干一些杂物，乃至于引路等等。这些人在清国的给官方文件中也确有提到，并斥之为汉奸。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当时的底层民众眼中，英夷与满族统治者没有本质区别，英夷甚至还会给自己更多的好处（起码有报酬，优于徭役），所以为什么不做一个“汉奸”呢？

不排除在某些情况下民众也会奋起反抗，譬如三元里之战。不过三元里百姓反抗的原因并不是国家或者民族这样宏大的概念，而是英军“开馆暴尸“，劫掠财物，以及强奸、调戏妇女。

还有一点非常有趣的现象，在鸦片战争的后期，江南的一些士绅会付给英军“赎城费”来换取英军对他们家园的不侵犯。这与三元里抗英的动机是相近的。也就是说“三元里等处民众进行的是一次保家卫国的战斗，而不是投身于一场保卫祖国的战争”讽刺的是，对于英军的反抗更近似于“官逼民反”而非自觉地为国而战或为民族而战。

清国，虽有良田万顷，然而不得民心，生产效率低下，纵使在经济的总额上占有优势，也不过是砧板上的鱼肉。清，气数已尽。

3.3 战争之后

鸦片战争仅仅是清帝国与列强之间发生的大大小小的若干战争的开始。事实上，鸦片战争距离在此之后的中法冲突还有大约二十年的距离。

所以战争的亲历者们在战争结束后做了什么呢？琦善在官场中摸爬滚打，与洋人交集不大，也没有对于国家的改革做出过贡献。林则徐提出整备水师，不过在 战舰与火炮的质量上没有任何改进，此时奕山提出仿制西洋轮船枪械，由于种种 原因被驳回。伊里布与杨芳没有建策。上面的奕山之后调任黑龙江将军，面对沙俄的炮舰外交，他所做的只有妥协再妥协，签下《瑷珲条约》。他从鸦片战争中学到的，似乎也只有委曲求全。刘韵珂重整海防，只不过是把当年被摧毁的炮台原样修复罢了，好不吸取鸦片战争落后的防御体系带来的低下战斗力的教训。耆英开始与英吉利私下拉拢关系，居然变成了“顺夷”。

没有人真正的从战争中吸取教训，所以我们会在这次战争之后一败再败，直到天朝的大崩溃。黑格尔曾说：“历史的最大教训，就是我们从来不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多么透彻！

我们本来是有机会的。我们曾经的藩国，日本，也曾经历黑船事件，他们没有经历我们这样的惨败，却知道立刻向西方学习，搭上了近代化的末班车，并在数十年后给了保守的我们狠狠一击。以我国的资源条件与起点水平，天朝是完全可以在鸦片战争之后崛起，并成为超过日本的强国的。

但我们其实并没有机会。我们的一贯强大使我们没有考虑过系统的学习，我们的庞大导致我们决策与改革的极度困难。历史，没有偶然。

3.4 造神运动：由林则徐所想到的

为什么单独提到林则徐呢？因为他是被主流所认为的鸦片战争中的“忠臣”，乃至于被认为是可以在战争中力挽狂澜的英雄（假如他在战争期间没有被贬职）。但是研究这段历史，以及这本书本身，都让我认识到这不过是一个偶然。

林则徐无疑是一个忠臣，一个英雄，但他是否能够赢得战争的胜利？显然不能。林无疑是最早睁眼看世界的晚清官员之一，但是睁眼的程度远远不够，这一点从上文林关于水师的整饬建议就可以看出，他并没有认识到新式海军的作用。而关于林能够带领战争胜利的说法，一方面是战争中英军没有进攻林的防区所给人的假象，另一方面就不得不说是天朝文化体系的自我辩解。

我不想说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自欺。因为这种行为是无意识的，自发的。正如上文天朝的自洽理论体系，我们认为在正常情况下我们是不败的，但事实是我们失败了，那一定是某些地方出了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核心集中于“天朝的理论体系没有问题，只是执行的人有问题”，为了证明这一点，我们除了要证明琦善等人是奸臣以外，还要找到一个忠臣的典型。很不幸，林则徐被选中了。

这就是造神运动，也是天朝所擅长的自我证明的方法之一，也是我们民族骄傲甚至于自大的体现。我并不是否认英雄，也并不反对在正确的历史时期我们需要塑造英雄的高大形象来给予我们精神上的力量，但是若是把某些偶然甚至是想象进行加工从而得到我们始终强大并不需要改变的结论，这显然是荒谬的，这也正是我们在天朝的历史时期中所一直做的。从《列女传》到“二十四孝图”，我们的造神运动从未停止。当我们确实强大时，我们造神，这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有资格展示我们强大的一切；当我们的国家陷入危难需要我们去奋起时，我们造神，因为没有榜样我们无法获得力量；但是，当我们面临危险却造神来沉迷于强大的幻象时，我们就走向了崩溃。

林则徐作为神，使知识分子相信天朝不需要大改良大换血。作为正面形象的林与作为负面形象的琦善等人成功使得主流社会以道德评判抹杀对于事实的理性分析。而面对紧急的变故，道德评判是最脱离实际且最无用的，空谈误国，莫过于此。

造神无所谓好坏，但在不恰当的时机，造不恰当的神，并深陷其中，这样的国家必定崩溃。

1. 多余的话

曾经的我们无比强大，但我们也亡于强大带来的自负，这种自负甚至曾经深入人心成为公理一样的存在，也使我们错失了许多改革的良机。大国的骄傲，自然伴随着大国的伤痛。

我们也应该恐惧。目前的世界潮流已经把我们推到了世界第二的水平，而世界第一的地位也是可以预见的。我们应该如何避免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